

湘江头条



上世纪八十年代，袁隆平在撰写论文。

在《袁隆平全集》(湖南科技出版社2024年版)中，公开发表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的科研、工作、生活书信计有45封，其中家信9封，是他写给他妻子邓则的，书信的时间跨度从1967年到1987年。这些家信是袁隆平对妻子述说的一些家中日常小事，反映出来的是袁隆平杂交水稻研究与发明中的侧面。

# 袁隆平的家书

胡佳武 罗毅华 廖良玲

9封信件落款的地点分别是：云南元江县、菲律宾马尼拉国际水稻研究所、中国农科院、北京机场候机室、长沙、海南三亚师部农场、广州东方宾馆，这时正处于杂交水稻研究艰难攻关与大力推广的关键时期，可以想见袁隆平当时工作的紧张繁忙。

最早的一封信写于1967年的云南元江县，这是他最早的南繁育种之行，信中说：“8月8日离开长沙，乘火车经柳州、贵阳于12日始抵昆明，17日乘汽车来往西南方向行两日才达目的地——元江县。长途跋涉，很感疲劳，尤其近来各地的交通运输情况都是半瘫痪状态，乘客拥挤之状实难形容，真是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经过10多天艰难的长途跋涉，袁隆平也与大多数人一样，发出了“出门时时难”的感叹。

初来乍到，袁隆平以农业科技工作者特有的眼光，描述了这里的自然环境，“元江是云南最热的地方，地势特殊，四面皆高山，中间一个下凹的平地，大约比安阳的平地还略大一点，水稻可一年三熟，为典型的热带风光，除水稻、蔗田外，到处是香蕉、番木瓜、龙舌兰及菠萝等热带植物。”他信中写道：“山野里的仙人掌长到1—2丈高，夜晚墙上的壁虎多得不可胜数，此地也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奇装异服，很为别致。”他告诉妻子：“我现住元江县良种场，离城3公里，县农技站设在此处。”“我打算在这里育苗，插秧后便回湖南(约20天，即9月初)，待抽穗时(约10月底)再来鉴定。”这一次元江育苗，就是杂交水稻研究的第一次南繁育种试验。

在很多信中，袁隆平都会告诉自己的行程或安排，以免家人挂念。“我们一行五人定于明(26日)晨乘机经香港转马尼拉，大约下午5时可抵国际水稻所，这次出国的任务是开会，在非停留10天左右，预计下月10日前回国。”(1985年3月25日)。“我已买好3月31日到广州的飞机票，原拟回家一趟，但昨天接中心来电，四月上旬国际水稻所派人到长，要与我商谈今年10月初在长沙举行的杂交水稻国际学术讨论会的有关事宜。同时，林乎加(原农业部长，现顾问)要在四月初来长见我，因此，这次就挤不出时间回家了。看来，要推迟到五月上旬待我从意大利开会回国后，才有一段时间回家看看，然后，我们一同去重庆接奶奶。”“试验任务虽繁重，但进展还顺利，小林在此人等事均好，他又测出了一个很有苗头的新组合，准备回湖南制种。”(1986年3月29日)。“昨天陪外宾乘飞机到广州，明日直飞马尼拉，这次到国际水稻所是以访问科学家的身份同他们进行杂交水稻的合作研究，时间是半年，但分两期，前三个月我要回国一次，安排自己的试验。因此，明年元月份可以回家过春节后再去。”(1986年10月6日)。这些是他匆忙的工作印迹。

邓则安江农校毕业后，分配在黔阳县的农技推广站工作。她不仅是家庭生活里的贤内助，也是袁隆平科研上的好帮手，袁隆平在信中有时也会交给她一些工作。“交你的试验种子，莫忘了播种，并请可靠的人管好。”“颜学明回校后，要他把我从国际水稻所带来的新品系在6月15日前播种，本田安排在中古盘1号田。”

袁隆平常年在外南繁育种和参加科

时将此信投邮。”袁隆平的工作是紧张忙碌的，在机场候机的时间，他也会利用起来。

袁隆平患慢性肠胃炎，如何克服病痛的影响，也是他们信中谈论的内容。“我来这里已半个月了，迄今尚未发现过肠胃病，身体和精神状态均比上次好得多，原因在于我这次带了一些对症的好中成药，若稍感不适，便服药预防，收效甚好。”在另一封信中，他告诉妻子：“杨梅罐头已成为我的生活必需品，若稍有感染，我马上便吃杨梅，效果特好。”

袁隆平对待三个儿子的教育缺憾较多，有时也会抽空尽量弥补。他在1985年5月25日的信中写道：“寒假期间，我自由自在，得到了充分的休息，但也有几件事，使我感到遗憾和内疚，即对五二、五三的学习抓得不紧，父不严，加上母又太慈，致使孩子学习不好，是我之过也。前几天在北京新华书店见到《文科综合辅导与训练》一书，特给五二购一本，希望你认真地看看，同时你也要督促他做该书的习题。”袁隆平的三个儿子分别起名为定安、定江、定阳，老大袁定安是五一节出生的，小名为五一，老二老三则分别以五二、五三唤之，这样非常简便。

1987年夏天，老二袁定江即将参加高考，他专门写信给家里交代：“五二在考试期间，一要加强营养，二要充分休息。友人建议，每天早晨可喝两碗人参汤(三至四克人参参与精肉蒸，不放盐，只喝汤，不吃肉和参)，有利于醒脑提神(但切记不能过量，以免过度兴奋而导致反效果)。要让他安静无虑的睡好午觉，即要有人在考试期牺牲三天午觉值班，保证及时喊醒五二。”信中他还叮嘱道：“7月14日为全省统一填报志愿的时期，选什么学校和专业，与录取与否和能否进好学校关系甚大，需三思而行。原则是：若考得好，可适当选好一点的专业和学校；若平平，则要有自知之明，可选二、三流学校和非热门专业。”对老三袁定阳的学习，他也特意交代：“五三也应较严格地监督他学习，要他订好暑期学习计划和作息时间表，并经常检查和抽考。”信写完并已落款，但他仍觉得强调不够，在最后又专门写上几句：“‘业精于勤而荒于嬉’，以此古人之名言赠给三个小孩，希望他们牢记在心并身体力行。”(1987年6月30日)。

## 三

袁隆平对同事特别关心、关爱。在1981年3月24日的家信中，他给妻子邓则交代的三件事，有两件都是同事所托之事。

一件事是购买收录机。“曹老师和王业甫都想买收录机，此地四喇叭的价约270—280元一台，加上打税，估计要470—480元，但我只能带一台，他们谁愿意，请来信告之。”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商品匮乏，日本产的家电产品既先进又价格便宜，大多数人出国回来时都要带些日本家用电器。袁隆平出国访问，身边的朋友想带国外产品的人不少，于是就有了信中所提到的购买家电产品之事。据邓则介绍，这次购买的收录机给了曹延科老师，此后不久购买的收录机就给了王业甫老师，当年袁隆平给同事们从国外带回了多台电视机、收录机。

另一件事就是同事的工作调动。“关于王业甫调工作一事，在长沙我去农业厅科教处谈了一下，他们说科教处主要缺笔杆子，而且执笔的。看来，他调科教处不那么容易，需再做工作或另找单位。”王业甫是安江农校的作物学教师，其妻子在国防科技大学工作，两地分居生活十分不便，在袁隆平的极力推荐和其个人的不断努力之下，后终于如愿以偿，调入省农业厅科教处工作。

往事如风，袁隆平院士家书中的故事虽已远去，但其中表现出来的家风、情怀和精神依旧熠熠生辉。

袁隆平的家书。 通讯员 摄

资料图

# 船山先生，在自己的王国驰骋

——专访纪录片《船山先生》文学撰稿人聂茂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廖慧文 通讯员 李雪

王夫之(1619—1692)，后人称之“船山先生”。是中国明清之际思想家，“四大启蒙思想家”之一。近日，四集纪录片《船山先生》在湖南卫视、芒果TV开播，讲述王夫之历经家破国碎、坚持抗争，终成“中国哲学史上的一座孤峰”的经历。

该片主创为纪录片《中国》的制作团队，而文学撰稿人是中南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聂茂。去年，王夫之诞辰405周年，聂茂出版了他写作了12年的长篇历史小说《王船山》。在漫长的时光里，聂茂阅读他，理解他，重塑他，与这位四百年前的哲人一起，在“自己的王国”里驰骋。纪录片首轮播出后，《湘江副刊》专访聂茂。

## 做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有惊喜也有遗憾

**湘江副刊**：总导演李东绅说，这次是他最难的一次创作。作为文学撰稿人，您有这样的感受吗？

**聂茂**：作为《船山先生》的文学撰稿人，我能够理解他所说的“最难”。原因在于，一是研究船山先生的资料都是学术性的，较为枯燥，不适合纪录片表达；二是船山先生存世的著作也是千万字，且他的著作非常难懂；三是船山先生所写文章涉及面太广；四是船山先生好古雅，爱用典，加之他一生不与清廷合作，为避免文字狱，他写得非常含蓄，即便是专业人士也很难真正读懂吃透；五是最重要的，船山先生生前寂寂无名，他的师长、同窗、朋友和家人等鲜有鼎鼎大名者，正因为此，要比较准确、全面、客观、真实地还原船山先生的一生是十分困难的事情。

**湘江副刊**：您之前写了历史小说《王船山》，纪录片的撰稿与小说创作最大的差别在哪里？听说纪录片的文本创作历时半年，纠结在何处？有没有什么遗憾之处？

**聂茂**：历史小说可以秉持“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原则，可以虚构一些人物、一些场景、一些对话，可以虚构一个充满悬念又符

合逻辑的文学世界。但纪录片则不同，它要求的是全面真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不允许任何虚构，都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2024年9月25日，我应邀参加纪录片启动仪式，作了发言。李东绅一听，当即推翻了自己团队历经半年的写作计划，决定由我来担任文学脚本的撰稿。我只花了5天时间就完成了写作。我的前期基础扎实，要做的工作是删减和核查细节。纠结在于，传记忠于历史和船山先生的人生轨迹，但相对平淡，缺少生活气息。因此，我要做的是在忠于传记和不违背纪录片制作的基础上，尽可能地让人物鲜活起来。

现在播出的《船山先生》总体感觉很棒。要说遗憾，一是实景人的表演与大众心目中的形象有差距；二是船山先生的诗词歌赋没有很好地融入其中，这些作品既是其生命历程的徘徊挣扎，又是他的哲学深思与精神寄托；三是船山先生的家人如父亲、大舅和大哥的影响有较大提升空间；四是石鼓书院与岳麓书院的求学经历及其同窗学友的青春岁月表达不够；五是在湖湘文化的传承性上如对屈原、周敦颐等承继与开新方面有所不足。

## 船山研究的学界之“热”与大众传播之“冷”

**湘江副刊**：船山思想艰深难懂，为何能在近现代以来还能有这大的影响力？近几十年来，船山研究是“冷”还是“热”呢？

**聂茂**：船山思想难懂，但寻找革命真理和前进灯塔的先辈们中有很多能人圣贤。他们在前面做了许多阐释性工作，使得后来者越来越觉得船山思想的可贵与难得。这样的一个人，一生大部分时间流离失所，有许多机会去当大官挣大钱，可为了自己的信仰，他在南岳诸峰间徘徊，思考的是国家的复兴和民族的富强。而船山先生对中华民族崛起的渴望，不正是代代一代中国人的渴望吗？这是船山先生影响力越来越大的原因所在。

近几十年来，船山学的研究已经成为“显学”。但学界的“热”与大众的“冷”形成巨大反差，许多人搞不清王夫之、王船山、王阳明和王守仁究竟是几个人。这就恰恰说明纪录片《船山先生》的制作和播放是多么的重要。在新媒体语境下，应不断推出一系列文化产品如电影、电视连续剧以及短视频等，将船山先生的形象和思想深入到大众中。

**湘江副刊**：船山先生一生以“亡国孤臣”身份自居。清廷还是和

## 谱曲、弹琴、爱做饭，这个先生不“高冷”

他有接触的，清朝的剃发易服令为什么没有波及他？他以文化区分华夏，在晚年对清廷的态度是否有较大的转变？

**聂茂**：清朝的剃发易服令当然波及了他，所以他躲进山里。当清廷派人上山时，他又不断漂泊、流浪。他一生瞧不起清廷，认为他们是“蛮夷”，但康熙盛世以及百姓安居乐业，让他感觉到世道发生变化。他不断追问和思考，终于探究出根由：康熙之所以出现盛世，统治者的治国理政的那套方略，正是他一直要维护的以儒家文化为主

流的“正道”。他深刻反省大明王朝的灭亡，终于意识到，自己苦苦捍卫的只是一个王朝中国。就像历史上所有的王朝一样，被滚滚的历史车轮所碾碎。所以，他有了文化中国与王朝中国的区分。

船山先生离王朝中国越来越远，距文化中国越来越远。许多年后，他才看清两者之间的深刻关系，不禁哑然失笑：他曾经飞蛾扑火般爱上的中国其实只是一个王朝，一个皇权，而这个王朝或皇权不在乎他的死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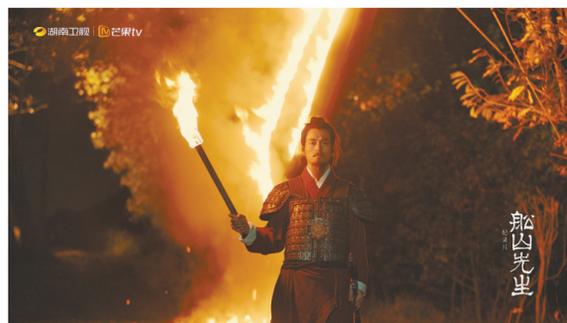
**湘江副刊**：纪录片中第一集就提到了当时的世界大势。晚明有开海思潮，西方科学传入中国后，影响了部分国人的实学观，船山先生的思想是否受到此影响？

**聂茂**：船山先生正处于明清改朝换代、东西碰撞异常激烈的时代。当时，欧洲历算学的输入，以利玛窦和徐光启合译《几何原本》为代表的中西文化交融相互影响的复杂时期。而船山先生对西学是持开放性的态度。

**湘江副刊**：船山学自晚清始显，受其滋养的一代代湖湘英杰为推进中国近代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后来者的身影(第四集的尾声)，您怎么看待这样的影像叙事手法？

**聂茂**：我很赞赏这一集的叙事表达，其核心命题是“发现船山”以及这种发现的艰难过程。

坦率地说，船山先生的被发现和被重视是非常小概率事件，自他去世后的300多年，中国发生了多少大事，一大批仁人志士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地寻找理论依据、价值坐标和精神支柱。



纪录片《船山先生》海报。

下。他经历了南明的朝堂，也看清了百姓生活的苦难，他对历史以及历史进程的逻辑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对当代青年的启迪就是：要像船山先生那样，“相信就能看见”，乡试失败，他关注的还是“天下事，少年心”，不为自己的得失而改变自己的信仰。努力做一个纯粹的人、有自己王国的人、灵魂含香的人。

**湘江副刊**：无论是在著述中还是在纪录片中，船山先生都是比较严肃的形象。您在阅读和研究中，有感受到他其实是非常鲜活的吗？

**聂茂**：船山先生的“高冷”和“严肃”形象，完全是一种误读。他的爱好很广泛，好交友，喜辩论，喜酒，作诗，静养，打坐，样样都会。他家里有一把祖传的龙星剑，他很喜欢舞剑。他还会谱曲，也会

你看，他是多么有情趣的一个人。